

# 跨越国界的合作

## ——中瑞学者在《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和出版中的互动

李锐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1922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刊的《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 是中国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之一, 其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跨国科学合作史。为推动中国古生物学发展, 中国与瑞典学者采取瑞方出资, 标本双方平分, 成果在中国刊物发表的科学合作方式, 并在两地分别设立“北京出版基金”和“瑞典出版基金”, 从而促成了《中国古生物志》的创刊。后在两项基金相继耗尽, 出版陷入困境之时, 双方在资金使用上产生分歧, 并因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矛盾升级, 最终经丁文江函请瑞典王储调解方得缓和。双方在解决根本分歧后, 秉持契约精神和互信原则, 以节约成本、加快出版为目标, 协商达成涵盖经费、印刷和销售的新方案。《中国古生物志》的创刊和出版历程, 既展现了丁文江、翁文灏和安特生等中外学者推动科学发展的远见, 也见证了中国学者维护科学权益的努力, 以及中瑞学者间互利互信的合作精神。

**关键词** 《中国古生物志》; 中瑞科学合作; 中国地质调查所; 丁文江; 翁文灏; 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5)04-0460-22

《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Sinica*)是1922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办的学术刊物, 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科学期刊之一。<sup>[1-2]</sup> 该刊专门发表中国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主要以英文发表, 少量以德语等其他语言撰写, 配有中文摘要。分

收稿日期: 2024-02-21; 修回日期: 2024-08-08。

作者简介: 李锐洁, 1994年生, 广东潮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民国科学史, Email: liruijie@ucass.edu.cn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找矿资料集成与历史研究”(项目编号: DD20243548);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跨国科学合作研究(1914—1937)”(项目编号: 2024-KY-057)。

甲(古植物学)、乙(古无脊椎动物学)、丙(古脊椎动物学)、丁(古人类学)4个系列。1937年,该刊出版至100分册时,启用新的编号系统,改为新甲、新乙、新丙、新丁4种。1939年,该刊因战争被迫停刊。1949年后,《中国古生物志》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管理与编辑,延续至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生物志》的创刊与早期出版史,深深植根于中国-瑞典科学合作的背景之中。然而,或因史料所限,这段潜藏于刊物背后的跨国出版史,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尽管学界对中瑞科学合作史已有诸多研究,但对于双方有关该刊的合作渊源却鲜有深入讨论。<sup>[3-10]</sup>现有研究对早期《中国古生物志》的考察,大多是探讨该刊在中国古生物学科建制化中的意义,或是其与相关人物或机构的关系。<sup>[11-12]</sup>目前仅见瑞典学者扬帆(Jan Romgard)利用瑞典一手档案,考察了该刊的创刊背景,并揭示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合作对创刊的关键作用。<sup>[6]</sup>不过,关于该刊合作出版的具体过程,包括丁文江、翁文灏与瑞典方面的协商细节,合作方案的最终确定,跨国出版的具体情况,以及合作中的互动细节等问题,均有待深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掘的瑞典档案,结合相关中文史料,进一步梳理《中国古生物志》在中瑞合作框架下的创刊过程,以及中瑞学者在跨国出版中的互动情况,从而深度揭示《中国古生物志》早期出版史的历史意义,在更宽阔的尺度下理解近代中外科学合作的复杂情况。

## 1 创刊背景与相关协议

在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的孙云铸回忆:

是年丁文江、翁文灏、克鲁格(IVar Kreuger)、安特生、葛利普诸先生,以中国化石材料甚多,长篇研究不便在《地质汇报》发表,特发刊一种专著,名曰《中国古生物志》,分甲、乙、丙、丁四种,甲种载古植物,乙种[古]无脊椎动物,丙[古]有脊椎动物,丁种专刊人类化石及其用具。每种分为若干卷,卷又分册。丁文江、翁文灏两先生任编辑,由中外专家分别担任研究。德国斯罗塞(Max Schlosser)教授、瑞典韦曼(Carl Wiman)教授、赫勒教授赞助尤力。<sup>[13]</sup>

翻阅《中国古生物志》早期版本,可见孙云铸所提及人物与该刊的深厚渊源。其中,该刊与瑞典的联系尤为引人注目。例如,瑞典企业家伊瓦·克鲁格(IVar Kreuger, 1880—1932)被列为刊物“提倡人(Founder)”,瑞典古生物学家维曼(Carl Wiman, 1867—1944)和赫勒(Thore Gustaf Halle, 1884—1964)则被列为“名誉研究员(Honorary Research Associates)”。(图1)要追溯这些渊源,需回到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瑞典在古生物学领域的合作历史。

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古生物学的发源地,首任所长丁文江深谙“古生物学是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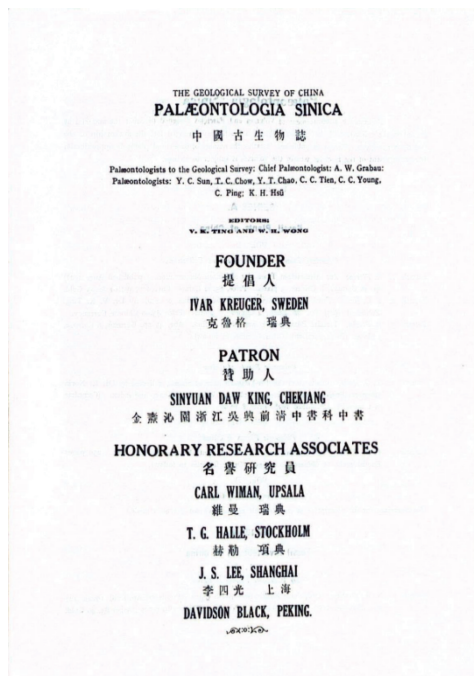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古生物志》插页信息<sup>[14] ①</sup>

学的根本”<sup>[17]</sup>，故大力倡导并开展开创性工作。1913年地质研究所成立，首开古生物学课程，丁文江“成为第一位在中国讲授古生物学的人”。<sup>[18]</sup>1914—1915年，丁文江赴云南进行地质与古生物学调查，为地质调查所采得首批古植物与古无脊椎动物化石。由于中国缺乏相关专业人才，丁文江只能将化石送至欧美国家进行鉴定和研究。<sup>[19]</sup>

地质调查所与瑞典的古生物学合作，得益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从中牵线。1914年，安特生以农商部顾问身份来华，协助北洋政府勘测矿产资源，他凭借专业学识和人脉，迅速成为中瑞科学合作的推动者。1915年，安特生与刚从云南考察归来的丁文江结识，并于次年借回国之机，将丁从云南采集的古植物化石带交瑞典古植物学家赫勒鉴定，由此开启中瑞古生物合作研究的序幕。在丁、安共同安排下，赫勒于1916—1917年来华进行为期一年的古植物化石采集，地质调查所年轻的调查员周赞衡奉命陪同考察。周赞衡后被派赴瑞典师从赫勒深造。([6], 110页; [8], 52-54页)鉴于地质调查所古脊椎动物化石不断累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古脊椎动物学家维曼于1917年受邀参与研究。

① 检阅中国地质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生物志》各分册可知，该刊自1924年起开始出现此插页，甲、乙、丙种系列均有，颜色有红、绿、黄三种。此插页列有该刊已出版或即将出版之分册题名及出售地点，似为宣传之用。1930年，师丹斯基所著《中国旧新生代哺乳类化石》一书的插页中，曾将步达生列为“名誉研究员”。<sup>[15]</sup>该插页于1932年后被删去。1932年12月19日安特生致翁文灏函中提到：“我很遗憾地提请您注意一个令人惋惜的事实：伟大的金融领袖伊瓦尔·克鲁格先生在与世界经济大萧条作斗争时，因神经紧张而崩溃，于今年年初在巴黎自杀。因此，他的名字应从《中国古生物志》中删去。”<sup>[16]</sup>

中瑞古生物学合作，实则离不开瑞典提供的大力资助。1917 年，安特生通过好友拉各留斯(Axel Lagrelius, 1863—1944)<sup>①</sup>，设法在瑞典筹措 45 000 瑞典克朗研究经费，后增加至 70 000 瑞典克朗。<sup>[20]</sup>为支持安特生在华科学活动，1919 年 9 月 15 日，瑞典成立了“瑞典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Committee)。该委员会最初由 3 名成员组成：海军上将路易斯·帕兰德(Louis Palander)任主席，拉各留斯任库司，贡纳尔·安特生(Gunnar Andersson)<sup>②</sup>任秘书。1920 年帕兰德去世后，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f Adolf)接任主席。在瑞典王储的领导下，瑞典中国委员会积极为安特生在华科学活动筹集经费。([20]; [8], 68-69 页)至此，在瑞方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安特生兴趣转向古生物化石采集<sup>[21]</sup>，中瑞科学合作也由寻找矿产资源向古生物领域进一步拓展。

1920 年，在丁文江的斡旋下，安特生成功地从北京政府农商部获得自 1921 年 5 月起为期 3 年的新聘期。安特生在继续保留“农商部矿政顾问”身份的同时，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经农商部批准，他可沿丁文江设计的路线，自费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双方共同商定，安特生考察期间所采集的古生物化石，在运至瑞典完成鉴定后，第一套(first set)送给瑞典博物馆，第二套(duplicate set)送还中国。所有研究成果必须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刊物上，以此确保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成果“首发权”(primeur)。同时，安特生承诺从其新聘期内薪金中捐出两万银元(按汇率折合约 10 万瑞典克朗)，专门用以支持地质调查所的出版事业。<sup>[22]</sup>当然，要完成中国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和出版，安特生仍然需要来自瑞典合作者的支持。

1920 年 3 月 16 日，安特生代表丁文江致信赫勒，说明此次合作原委，向赫勒提出两个请求：其一是恳请赫勒授权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出版他的专著。为何赫勒的专著如此重要？因为古植物化石是当时划分地层最可靠的工具，丁文江希望通过出版这些专著，一方面应用于中国的煤矿勘探，另一方面借以提升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地位。其二是希望赫勒协助免除图版费用。赫勒拥有一支由瑞典自然博物馆和瑞典科学院资助、专为瑞典科学院绘制图版的绘图师队伍，故安特生恳请他争取科学院的支持，豁免此项费用。作为回报，安特生转述丁文江提出的两个互惠性建议：

1. 所有由那两万银元资助出版的专著，地质调查所将向我提供 200 册印本。其中，90 册将转交给作者，10 册由我留存，剩余的 100 册将由丁先生和我共同赠送给瑞典皇家科学院图书馆，但条件是不得用于销售或国际交换。这些出版物不仅包括植物化石的专著，还包括由我采集的其他材料的专著，我们诚挚希望科学院能欣赏这一提议。

2. 丁先生提出了一个完全新颖且我认为非常开明的建议：作为对您同意为地

① 拉各留斯(Axel Lagrelius, 1863—1944)，瑞典企业家，为“瑞典支持安特生在华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之一。

② 与安特生同名，时任斯德哥尔摩商学院(Commerci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ockholm)经济地理学教授。

质调查所撰写专著的回馈,他承诺在专著完成后,未来将向您寄赠由地质调查所制备的、且能为贵馆已有的中国标本增添价值的重复标本。<sup>[22]</sup>

概言之,中方做出如下承诺:一是专著出版后,向瑞方寄赠 200 册印本。二是未来向赫勒提供重复的化石标本。

然而时间过了一个月,赫勒却迟迟没有回复。4 月 17 日,丁文江亲自致信赫勒,再次表达合作的诚意。丁文江首先阐明他坚持在中国出版的考虑:由于中国的科学事业刚刚起步,“即使在部内,也很少有人重视纯粹的科学工作”,因此他希望通过出版系列刊物,用以奠定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地位。([6], 165 页)此外,丁文江希望将古生物描述与地层分析相结合以应用于地层划分,这种做法可能不符合瑞典刊物的出版惯例。丁再次说明安特生提及的两个条件,但强调“赠送条件是不得用于国际交换或销售”,足见他对成果“首发权”的重视。为争取赫勒的支持,丁在印刷方面也做出相应让步。<sup>[23]</sup>7 月 25 日,赫勒复函接受丁、安的提议<sup>①</sup>,双方还就出版事宜进行了更详细的协商。<sup>[24]</sup>

大概在 1920—1921 年间,丁文江已形成关于《中国古生物志》刊名、尺寸和内容的初步设想。据葛利普所言,丁文江是以《印度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a Indica*)作为蓝本。<sup>[25]</sup>因古生物图版较大,丁文江决定在地质调查所既有 8 开本刊物《地质专报》与《地质汇报》外,再单独出版一个 4 开本期刊。经与安特生商议,二人认为这个新出版物应采用像维理士《在中国的研究》(*Research in China*)那样的小 4 开版式,会比《印度古生物志》等大 4 开本更加方便。丁文江将每本专著的印刷总量定为 700 册,其中 200 册赠给瑞典作者、安特生和瑞典科研机构。<sup>[26-27]</sup>丁最初以古生物专著为出版重点,此后随着标本种类增多,研究范围拓展,《中国古生物志》扩展为甲、乙、丙、丁 4 个系列。

在此期间,安特生通过他在瑞典的人脉关系,特别是他的朋友拉各留斯继续为《中国古生物志》筹措出版资金<sup>[28]</sup>,并成功从瑞典企业家伊瓦·克鲁格处获得 5 万克朗的出版资助。为感谢克鲁格的慷慨资助,丁、翁将他作为“提倡者”,印在《中国古生物志》封面背部。由于名字以中英文印制,丁、翁特意为其起了相应的中文名,即“克鲁格”,“以便中国学生更好地了解 and 记住他”。<sup>[29]</sup>

1921 年初,在丁文江的建议下,农商部还聘任安特生为地质调查所地质陈列馆馆长。在中瑞达成合作意向之初,双方并未对古生物化石的分配数额做出明文规定。或许是出于丁文江的要求,安特生曾就化石分配事宜与瑞典方面进行协商,并希望维曼和赫勒能就此问题向丁文江作出书面承诺。<sup>[30]</sup>经过安特生的不懈努力,1921 年 12 月 20 日,维曼、赫勒就中瑞古生物标本分配和出版安排,向中国地质调查所作出书面确认。原文翻译如下:

① 从 1920 年 10 月 4 日丁文江致赫勒的信中,可知赫勒已于 7 月 25 日回信,表达了合作意愿。<sup>[24]</sup>

致中国地质调查所：

兹为确认先前关于中国地质调查所及安特生博士或其采集员所收集之脊椎动物化石与植物化石移交我们鉴定事宜的协议，我们谨此声明接受下列条款。

1. 材料将根据丁文江与我们订定的具体条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上予以描述。

2. 图版和照片将免费为中国地质调查所制备。

3. 第一套标本将由瑞典机构保管，由我们管理。

4. 第二套标本将在我们完成各部分工作后，完整归还给中国地质调查所。

5. 我们将根据古生物学界普遍接受的原则，将标本分为第一套和第二套。我们承诺秉持慷慨的精神(in a generous spirit)进行划分，务求归还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那套标本尽可能完整。

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1921 年 12 月 20 日

维曼 赫勒<sup>[31]</sup>

据此，我们可知此次中瑞古生物合作中，化石分配原则是瑞典拥有第一套标本，中国获得第二套标本。该协议本质是一份“承诺书”，成为日后地质调查所追还古生物化石的文本依据。<sup>①</sup>1922 年 7 月间，中瑞双方政府以换文的形式，确认了安特生对中瑞古生物化石分配与出版办法的解释。暂未看到原始档案，但《申报》刊出了相关信息。据安特生介绍：

凡近世动植物，每皆分取一份，呈于北京教育部。此系余于寄送他种种采集在于瑞典之前，亲手选择者。余所采集之险地介类及淡水介类，其全部皆寄于瑞京里克斯博物馆奥德纳博士，令其加以叙述，然后送还一份于中国地质调查所。余所采集之物品，其大部分为植物，加以述叙，编为一书，而出版于中国，命名□□□。其叙述之事，已由余瑞典友人赫雷、维曼二教师担任，允将稿本送来，并允照各物原形制成图报，寄送来华，以便随时印刷。其制图之费，则系二君所在之机关自备者。此因属二博物馆主任者之友谊。而中国政府对于此种科学事业，能与以重要之助力，与夫中国地质所诸同人，倾心助余，共成斯举，亦实令彼等有不胜感佩者也。<sup>[33]</sup>

这里涉及两方面改动。一、分配原则从对半平分改为“每皆分取一份”。安特生的表述可能过于简单，据瑞典驻华公使柏古通(David Bergström)<sup>②</sup>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函称，分配方法从“凡已得及将得之各种采集品，均应均分于中瑞两国之博物馆及科学会社”，改为“凡所有采集品已送或将送于瑞典，以求其整理而审定之者，由瑞典次第

① 1930 年，翁文灏在敦促维曼返还古生物化石标本时，提到“希望您能根据 1921 年 12 月 20 日由您签署的协议，将其他已描述的标本各一套寄给我们”。<sup>[32]</sup>

② 柏古通(David Bergström)，1919—1922 年担任瑞典驻华全权公使。

将其副号, 送还中国, 力求完备, 俾可代表全体, 交中国相当之机关收存”。<sup>[33]</sup>二、增加研究和出版说明。由赫勒、维曼等专家负责标本描述、图版绘制和专著撰写, 图版费用由瑞方承担, 完成后将手稿送至中国印刷出版。这一段文字可视为 1920 年后丁、安与瑞方人员就古生物合作达成的最终协商结果。

20 世纪 20 年代初, 安特生在野外调查时发现考古材料。在向地质调查所及中国政府汇报发现后, 中瑞双方的合作范围随之扩大至考古领域。安特生成功申请到瑞方的经费支持, 在获得中方许可后, 于开展古生物学研究的同时持续进行考古调查。由于该项目由瑞典政府全额资助, 安特生和瑞典资助方希望参照 1922 年中瑞古生物化石合作协议, 平等共享这批考古发现。

1924 年底, 丁、翁二人与安特生就所获考古采集品的归属问题, 进行反复磋商, 丁、翁通过字斟句酌的方式, 尽力争取中方权益。1924 年底至 1925 年初, 中瑞双方签订仰韶文物分配与合作协议, 内容涉及仰韶文物分配数量和质量、返还时间和成果发表等内容。<sup>[10]</sup>关于成果发表, 丁、翁再次提出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刊物上的条件。协议规定:

就科学报告的发表形式而言, 我们完全赞成安特生博士同意所有的报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 我们接受此为协议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将竭尽全力协助报告的出版, 使之与这些由自身体现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文化相匹配。但是, 我们不能承担 50 000 克朗之外的出版和印刷费用, 这笔资金是委员会的一员和丁博士一起从瑞典的一位捐赠者得到的, 其中的大部分将被用于出版脊椎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专刊。<sup>[34]</sup>

有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 仰韶文物的合作研究成果, 均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 从文字上确认了中方的成果优先权; 其二, 瑞方只承担由克鲁格捐赠的 5 万瑞典克朗出版费用, 这笔经费主要用于出版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植物化石的研究专著。其三, 实际上瑞方提供的资金远不止这些, 安特生承诺从其薪俸中捐赠的 10 万克朗, 同样用于出版《中国古生物志》。此外, 瑞方还提供了中瑞合作中野外采集、标本清理、鉴定工作和中瑞往返运输等全部开支。

除瑞典合作者外, 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A. W. Grabau, 1870—1964) 也被视作《中国古生物志》创刊人之一。杨钟健曾回忆: “自葛先生来华后, 始将此项材料, 开始作详尽研究, 于是有《中国古生物志》之刊行”。<sup>[35]</sup>为提倡中国古生物学, 1919 年丁文江赴欧出席巴黎和会时, 积极为地质调查所物色专才, 在美国请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sup>[36]</sup>1920 年, 葛利普应邀来华, 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在他的指导下, 李四光、孙云铸、赵亚曾、杨钟健等中国学者迅速成长, 成为中国古生物学科的奠基人。<sup>[37]</sup>葛利普来华后, 协助地质调查所鉴定无脊椎动物化石, 负责《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系列的出版工作。<sup>[25]</sup>

1922 年, 《中国古生物志》正式创刊。葛利普发表的《中国华北地区的奥陶纪化

石》，既是《中国古生物志》的开端，也是乙种系列的开篇。<sup>[38]</sup>甲种系列的开篇之作是瑞典古植物学家傅兰林(Rudolf Florin, 1894—1965)的《中国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sup>[39]</sup>傅兰林是赫勒的助手，受后者委托从事南满古植物化石研究。丙种由德国学者施罗塞(Max Schlosser, 1854—1932)的《蒙古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开其端。施罗塞为德国明兴大学(即慕尼黑大学)教授，因研究中国“龙骨”，1903年发表《中国灵长类化石》而出名。1922年秋，施罗塞受维曼委托，研究安特生采自内蒙古地区的一批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并于1924年5月出版此书。<sup>[40]</sup>1921年夏天，安特生在奉天锦西县勘探煤矿资源时发现人类遗骸，于是对沙锅屯洞穴进行系统挖掘和研究，其成果便是丁种第一篇《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石穴遗址》。<sup>[41]</sup>

## 2 合作“危机”及其化解

### 2.1 初期的安排与出版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瑞典出版基金，即克鲁格捐赠的5万瑞典克朗。二是北京出版基金，主要由安特生捐赠的个人薪金构成，部分由金焘捐赠<sup>①</sup>。通常所说的“10万瑞典克朗”是安特生承诺捐赠的金额，且应为一个估值。安特生在华期间的捐赠数额不详，但他在1926年回国休假期间，曾向丁、翁承诺将除养老金外的全部薪金捐作北京出版基金。<sup>[42]</sup>根据1930年丁文江与瑞典王储的通信记录，安特生最终捐赠的薪金数额为35 199银元。<sup>[43]</sup>由于克鲁格基金的条件是出版物必须在瑞典印刷，因此丁文江与安特生共同商定：瑞典出版基金主要用于印刷赫勒和维曼的古植物和古脊椎动物研究专著，北京基金则用于印刷安特生的考古专著和乙种无脊椎动物专著。<sup>[44]</sup>

为管理克鲁格基金和编辑专著，安特生向瑞典方面提议成立一个《中国古生物志》出版委员会(The Swedish Palaeontologia Sinica Publication Committee)。1923年1月22日，瑞典中国委员会讨论了安特生的来信，认为无需设立此编辑委员会，可由拉各留斯负责相关财务工作，各作者应直接与中国编辑对接。各作者应根据与中方的协议，定期向瑞典中国委员会汇报合作进展。<sup>②</sup>在安特生的努力下，拉各留斯、维曼和赫勒最终同意成立此出版委员会。

1923年3月30日，丁、翁致信拉各留斯、维曼和赫勒，就出版事宜作出若干安排：一、瑞方应在每年年末提供英文版账目，以便中方了解克鲁格基金的使用情况。二、正在编印的施罗塞的专著，将由北京出版基金支付费用，由维曼、赫勒协助编辑。后续的德国稿件将逐案讨论。三、印刷数量为800册，600册交付地质调查所，100册

① 具体数额未知，《中国古生物志》夹页中提到赞助人为“金焘沁园浙江吴兴前清中书科中书”。

② 为确保中瑞合作的顺利进行，瑞典中国委员会在1931年1月29日的会议上再次强调此项要求，相关信息由扬帆研究员提供。

赠予作者, 100 册赠予维曼和赫勒的机构。四、维曼和赫勒所在机构应免费提供可供复制的图版原件。五、瑞方承印的《中国古生物志》, 必须严格遵循北京印本的装帧细节与文献编号。针对瑞典印本运华制作摘要周期过长的困难, 经协商后翁文灏作出妥协, 同意瑞方发行的赠阅本可免配中文摘要, 但封面版式须与北京印本完全统一, 且所有印本须在封面末行标注“北京 (Peking)”, 扉页下方注明“由中国地质调查所, 北京 出版 (Published by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Peking)”, 扉页背页底端印制“由斯德哥尔摩印制 (Printed by Stockholm)”字样。<sup>[45]</sup>

在合作出版的最初几年, 瑞方自行负责瑞典和部分欧洲专著的校对和印刷工作, 再将一定数量的印本运回中国。地质调查所 1925 年度报告提到: “出版《中国古生物志》五种”, “由瑞典、德、英专家分任著作”, “内四种是在欧洲印刷”。<sup>[46]</sup> 1926 年度报告提到: 该年印刷“《古生物志》三种”、“欧洲专家分任著述”、“均在欧洲印刷, 再行运华”。<sup>[47]</sup>

在研究标本过程中, 瑞方逐渐形成古植物、古脊椎动物和考古 3 个部门。除赫勒、维曼和安特生外, 还有参与合作研究的众多学者, 如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员工傅兰林和史天秀 (Erik Stensiö, 1891—1984), 维曼的学生师丹斯基 (Otto Zdansky, 1894—1988) 和林斯顿 (Torsten Ringström, 1895—1939), 受维曼委托研究的斯罗塞, 安特生的助手巴尔姆格伦 (Nils Palmgren, 1890—1955) 等。安特生提到, 为研究甘肃陶瓮上的图像, 他曾与诸多著名同行合作, “比如阿恩 (T. J. Arne) 博士、阳士 (O. Janse, 1892—1985) 博士、汉娜·赖 (H. Rydh, 1891—1964) 博士, 以及列宁格勒的瓦伽耶夫斯基 (Bogajevsky) 教授。”([20], 27 页)

截至 1925 年 9 月 8 日, 克鲁格基金已累计支出 34 187.67 瑞典克朗。为确保各系列专著的顺利出版, 安特生将剩余的克鲁格基金, 平分给古植物、古脊椎动物和考古 3 个部门。同时, 为控制出版成本, 安特生向中方提出削减开支的技术性建议, 如优先选择价格低廉的铜版印刷, 缩小印刷字体, 并要求作者压缩篇幅, 只集中描述基本的特征。<sup>[48]</sup>

## 2.2 出版基金出现困境

1927 年因印刷杨钟健的博士论文一事, 中瑞双方在出版基金使用上首次出现分歧。1925 年杨钟健自北大地质系毕业后, 赴德国明兴大学深造, 专攻古脊椎动物学, 师从布罗里 (F. Broili) 和施罗塞。在翁文灏和维曼协调下, 瑞方将 3 箱中国啮齿类动物化石寄由杨钟健研究。1927 年初, 杨钟健将博士论文寄给翁文灏和维曼, 翁随即将其纳入《中国古生物志》, 安排在瑞典付印。维曼收到论文后, “回信甚为赞许, 并同意立即付印”。<sup>[49]</sup> 然而, 负责瑞方印刷事务的拉各留斯, 认为这笔费用应从北京出版基金支出, 因而拒绝印刷杨的论文。翁听闻后甚为恼火, 写信质询安特生。经安特生调解, 此事才顺利解决。

在处理杨钟健博士论文付印一事中, 丁、翁意识到与瑞方明确出版基金的使用规

范,“为未来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的必要性。为此,1927年7月5日,翁文灏向安特生提出未来九年的预算方案:除瑞典出版基金外,《中国古生物志》仍需70 000银元印刷费用,若再计入北京出版基金和安特生20个月工资,仍存在22 000银元的资金缺口。丁、翁建议继续将安特生的薪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收益,同时通过严格制版节约成本,以此弥补经费差额。丁、翁提议每年支出6 000—7 500银元出版经费,一半用于乙种系列或在中国印制的专著,另一半用于补贴瑞典基金不足支付的丁种及少量的甲、丙种系列。<sup>[50]</sup>可见为维系刊物的长稳运作,丁、翁二人颇费苦心。

然而,翁的方案尚未启动,瑞典出版基金已完全耗尽。1927年8月12日,安特生致信翁文灏,同意丁、翁对其工资的安排,并告知瑞典当时正在印刷师丹斯基、密勒(Miller)和杨钟健的论文,以及赫勒的大型专著,可能会用尽克鲁格基金。<sup>[51]</sup>同年10月3日,安特生告知中方:“瑞典出版基金已全部耗尽。”<sup>[52]</sup>

当时瑞方亟待付印的是师丹斯基关于周口店动物群的专著。1926年瑞典王储访华之际,安特生公布了师氏于1921年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牙齿化石,引发中外学界的轰动。1927年,步达生(Davidson Black)根据瑞典学者步林(Birger Bohlin, 1898—1990)在周口店挖掘的另一枚古人类臼齿,命名“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后改称北京猿人或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pekinensis*)。在此背景下,尽快出版这一报告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影响力。按照协议,瑞典学者的专著由瑞方承担印刷费用,然而此时瑞典基金已经用尽。最终,翁文灏破例动用北京基金支付了这笔印刷费用。<sup>[53]</sup>

1928年底,北京出版基金也开始面临短缺。在瑞典出版基金用完后,由于拉各留斯持续向中方寄送瑞方专著的印刷账单,翁只能继续动用北京出版基金进行支付。当时金银兑换率居高不下,印刷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导致北京出版基金的耗尽。据翁后续估算,安特生所捐赠的共计35 199.8银元的北京出版基金,具体支出如下:约27 450银元用于安特生相关专著的出版,其中包括安特生与步达生在北京印刷专著费用8 500银元;为在瑞典印制的论文制作中文摘要和装帧,连同运费合计3 500银元;支付给拉各留斯的费用14 100银元。另有7 000多银元用于出版与安特生无关的其他古生物学专著。总体来看,北京出版基金中约四分之三用于安特生相关作品的出版支出。<sup>[54]</sup>

另一方面,安特生承诺注入北京出版基金的欠薪也无着落。北伐战争兴起后,北方正政局混乱,翁文灏曾告知安特生无法支取其在华欠薪。<sup>[55]</sup>南京政府执政后,概不承认北洋政府与外国顾问合同的合法性。丁、翁在瑞典驻华公使代办雷尧武德(Baron Leijonhufvud)和前北洋政府法籍顾问宝道(M. Padoux)的协助下,极力争取安特生的欠薪,与南京政府展开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谈判。<sup>①</sup>为解决经费难题,丁、翁后续还向洛克菲勒

① 未看到安特生答复,最终结果未知。

基金会申请过出版资助。<sup>[56-57]</sup>

### 2.3 矛盾的升级

在意识到北京出版基金所剩无几后,翁文灏于1928年10月20日写信给拉各留斯,强调必须为《中国古生物志》非丙种系列专著预留印刷经费<sup>[58]</sup>,并且表明未来出版任何专著,须先征得中方同意。1928年11月15日,拉各留斯请翁文灏为维曼的专著《山东白垩纪恐龙类》(Ueber die Kreide-Dinosaurier von Shantung)支付2 900瑞典克朗的印刷费用。<sup>[59]</sup>1929年10月9日,翁文灏向安特生询问维曼专著印本运华进度,同时说明:

我很高兴看到维曼教授的恐龙著作即将出版。但我很困惑,除了很久前收到的一份样书外,为何印本至今仍未寄达。迄今为止,我始终按时支付拉各留斯开具的所有账单,但我提醒过他,未经事先告知且未获得我们逐笔付款的同意,切勿擅自印刷过多。鉴于我们资金有限,这确实是必要的预防措施。<sup>[60]</sup>

1930年5月6日,拉各留斯通过渣打银行向中方开具师丹斯基新专著(丙种6卷2册)印刷费用的新账单。<sup>[61]</sup>因拉各留斯事先未告知中方,此时地质调查所经费窘迫,无力支付。鉴于该书已经印出,翁提议延期支付,在下半年预算中保留相应金额。翁再次向拉各留斯郑重声明:

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并体谅我们的困难,即在《中国古生物志》手稿付印之前,必须向我们提交印刷其他分册的预算,以征求我们的同意。<sup>[62]</sup>

如果说拉各留斯不了解出版基金实情擅自印刷,加剧了中方财务负担,引发双方矛盾,那么安特生因家庭事务和生病住院,未及时回应中方诉求,则使双方的信任产生了“危机”。1930年6月25日,丁文江向安特生提议重订合作方案,表示“现在已经到了政策修改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为此,丁文江提出3项建议:一、由撰稿人和编辑共同商定待印专著,建议在每年7月预算编制前确定目录。二、提议1930年7月至1931年7月间瑞方专著的印刷费用,控制在5 000银元以内。三、在金银兑换恢复正常前,暂停瑞方的印刷工作。鉴于中瑞成本悬殊,建议优先考虑在北京印刷。<sup>[61]</sup>同年9月4日,丁文江再次去信,敦促安特生尽快与中方恢复联络。<sup>[63]</sup>然而,数月过去,丁仍未等到安特生的回音。

### 2.4 丁文江的“抗议”

鉴于中瑞双方屡生误解,拉各留斯曾委托瑞典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劳格培出面,协助与翁文灏沟通。翁认为此事有违常例,但碍于情面,仍口头答应劳格培的提议,即支付由拉各留斯开具的师丹斯基新专著(丙种6卷2册)的账单。然而,1930年10月9日,拉各留斯再次请中方支付英国鸟类学家鲁维(Percy Roycroft Lowe, 1870—1948)新专著共2 300瑞典克朗的印刷费用<sup>[64]</sup>,此举将双方矛盾推向了顶点。

10月30日,丁文江受翁的委托,以《中国古生物志》编辑身份致函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主席。在长达4页的信中,丁文江回顾了《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情况,表达中方

新的合作诉求。<sup>①</sup> 其内容可归纳成以下 5 个方面：

一、回顾瑞典和北京出版资金的来源、金额、分配方式和使用情况，说明双方在两处出版基金用尽后不断积累的矛盾和误解。根据安特生与地质调查所的协议，瑞典出版基金由两部分组成，即由克鲁格和诺尔比(Norrby)捐赠、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保管的 53 000 瑞典克朗，以及安特生从其薪金中捐出并留在北京的 35 199 银元。双方曾商定，瑞典基金用于印刷在欧洲撰写的著作，北京基金用于在中国撰写的著作。1927 年 6 月瑞典基金用尽后，中方开始承担瑞方专著的印刷费用。

二、重申中瑞合作出版协议，强调协议条款的文字与精神。关于科学成果发表，1922 年中方与维曼、赫勒签订的原始协议为：“材料将根据丁文江与我们订定的具体条款，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上予以描述”，1924 年 12 月 31 日与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签订的协议规定：“就科学报告的发表形式而言，我们完全赞成安特生博士同意所有的报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我们接受此为协议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三、指出瑞方未履行的义务。在丁看来，首先是拉各留斯未经中方同意擅自印刷，且收取高额印刷费用，并借瑞典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劳格培向中方施压。其次，安特生忽视中方通信，不予回应。此外，瑞方未按时返还考古标本，也未按约定提交出版基金的年度账目。

四、建议替换拉各留斯的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秘书职位，新秘书应履行处理通信、提供账目、联络专家、对比成本等义务：

(1) 处理所有信件，以免我方信件石沉大海。(2) 提供出版基金的最新账目。

(3) 与维曼教授、赫勒博士及其他科学工作者保持联络，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所做工作的定期报告，最重要是每年有一个可靠的印刷计划，以便我们提前知悉我方债务。(4) 比较欧洲各国印刷成本，以便我们能够印刷尽可能多的、与我们的资源和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相匹配的专著。<sup>[43]</sup>

五、提议中方每年向瑞方提供 5 000 银元，用于《中国古生物志》剩余专著的印刷出版。同时承诺尽力保障安特生考古报告的出版。<sup>[43]</sup>

## 2.5 “危机”的化解

1930 年 11 月 4 日，丁文江以朋友身份私信安特生，解释他直接联系瑞典王储“不过是作为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古生物志》代表的职责”，表示中方一如既往地希望与他合作。<sup>[65]</sup> 11 月 21 日，安特生给丁文江回信，在官方通信中，安特生首先解释拉各留斯与中方产生分歧的原因，试图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说明自己因病未能及时回复通信，并对丁文江 6 月 25 日通信所提方案作出正式回应。<sup>[66]</sup> 在私人信函中，安特生坦陈他所面临的工作高压和健康状况，并向丁文江表示真诚的歉意。<sup>[67]</sup> 同日，安特生致信翁文灏，表明瑞方已在筹备返还第四批考古标本。<sup>[68]</sup>

<sup>①</sup> 此信附有丁文江致安特生(1930 年 6 月 25 日)和拉各留斯致地质调查所(1930 年 10 月 9 日)两函。

在与拉各留斯深入交流后,安特生发现,因部分关键信件的遗失,中方与拉各留斯之间产生了误解。1930年11月28日,安特生向丁逐一梳理与澄清中瑞双方的诸多误解,包括以下7点:一、拉各留斯已就翁文灏1928年10月20日信函作出回信,似未送达中方;二、拉各留斯声称,已将克鲁格出版基金的账目提交给中方;三、拉各留斯通过北京临时代办联系中方,实为尽快商讨师丹斯基专著的出版方案,可能被中方误解为“施压”;四、承认拉各留斯于1930年10月9日致翁文灏信中的部分措辞确实欠妥,并为此致歉;五、解释瑞方未获许可印刷师丹斯基专著的原因,承认此举不符程序,但情有可原,与中方共商解决方案;六、安特生将与维曼、赫勒针对丁文江1930年6月25日信中所提方案,开会商讨《中国古生物志》的未来出版安排;七、解释第四批考古标本返还延误之原因,系因安特生夏季生病及私人事务所耽搁。<sup>[69]</sup>

由于安特生不仅是中瑞科学合作的创造者、负责者和研究者,更是丁文江极为信赖的合作伙伴与友人,丁希望通过安特生的帮助,加强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对中方诉求的重视。1930年12月9日,丁在致安特生的官方信函中,再一次强调合作出版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several questions of principle)”。概言之,即:中方有权提前知晓瑞方专著目录和印刷估价,拥有瑞方研究成果的独家发表权。在此函中,丁提出中方对维曼出版工作的若干不满,如未遵循刊物编码规范、未提供出版目录等。<sup>[70]</sup>同日,丁在私人信件中向安特生反映中方对维曼古生物标本返还工作的不满意。<sup>[71]</sup>对此,丁据理力争,有理有节,坚定维护中方权益。

安特生对丁的诉求极为重视。他一面将此事提交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审议,另一面通过私人关系调解中方与维曼之间的矛盾。经过安特生的居中协调,双方的误会得以澄清。1931年1月16日,安特生针对丁、翁来信中所提各项问题,逐条分析中方与维曼之间存在的误解和原因:一、关于出版细节未能统一的问题,维曼承认存在此种情况,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地质调查所刊物的编辑规范;二、维曼专著标题与《中国古生物志》总标题不一致的问题,实为维曼基于学术考量所作的调整,具有一定合理性;三、关于维曼未向中方汇报进展的问题,实因维曼合作者众多,且定稿时间不定,无法定时汇报,但维曼承诺将尽快向中方提供丙种系列剩余专著目录;四、关于维曼是否将足量优质古生物化石返还中方一事,安特生认为其中存在误解,表示愿与中方商议解决方法。同时表示已送还中方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具有相当代表性,愿再向中国增送数套;五、对于维曼拒绝将周口店动物群模式标本寄回北京供对比研究一事,系因维曼担心标本过于脆弱,表示愿在不承担过大风险的前提下安排运送。<sup>[72]</sup>

1931年2月2日,从四川考察归来的翁文灏,在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致信安特生表示,“您与丁博士秉承我们以往合作所特有的友谊精神,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不胜欣慰。”<sup>[73]</sup>同年3月24日,丁文江向安特生表示:“我们对贵委员会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整个问题深表满意。我衷心希望整个安排能顺利进行。”<sup>[74]</sup>

中方的意见促使瑞典中国委员会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瑞典王储在会议中特

别强调，各方必须全力满足中方合作伙伴的需求。针对中方对维曼的意见，瑞典王储亲自敦促成立调查组，指派高本汉开展相关调查工作。([6]，204-205 页)此后，安特生与维曼均曾联络瑞典教育部，瑞典王储本人亦曾出面，请求瑞典政府追加拨款，专门制作一批高质量的化石复制品送还地质调查所。瑞典中国委员会还要求瑞典相关机构加快工作进度，要求安特生、维曼和赫勒定期向中方汇报标本返还和成果出版的进度。<sup>①</sup>

### 3 新方案的出台与实施

在妥善解决了出版合作中的原则性分歧后，面对新的形势和条件，丁、翁继续与瑞方频繁互动。双方基于原有的协议框架，就出版的细节性问题进行反复磋商，进一步形成包括经费利用、印刷地点、印刷公司和销售方案等在内的出版新方案。其目的在于节约成本，尽快完成瑞方所有专著的出版。

#### 3.1 经费利用

按照双方新的约定，瑞方须提前一年制定明确的年度出版预算。<sup>[73]</sup>中方承诺每年向瑞方提供 5 000 银元，用以印制瑞典学者的古生物及考古学专著，同时清偿此前由拉各留斯印刷厂遗留的债务。此外，翁文灏向安特生委婉表示，由于中方待印专著过多，出版资金有限，希望瑞典能自筹经费，所筹款项将全部用于瑞典专著的印刷。<sup>[75]</sup>

#### 3.2 印刷地点

鉴于中瑞印刷成本过于悬殊，丁文江曾于 1930 年 6 月 25 日致函安特生，建议将专著送回中国印刷，后经调整，改成“在英国印刷图版，在这里(即中国，引者注)印刷文本”。<sup>[65]</sup>跨国印刷必定带来校审麻烦，丁为此给出新的审校方案：由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签约，委托葛利普审查标题格式，聘请《北京导报》专业校对人员进行有偿审校，最后将终稿送至欧洲审阅和印刷。<sup>[70]</sup>安特生充分采纳丁的建议，但他也指出，中国与欧洲的印刷成本差异，主要在于印版价格，如能筹到经费，或缩小印版价差，问题将迎刃而解。<sup>[69]</sup>在印刷地点的选择上，中瑞双方各有考量：中方意在控制成本，瑞方则追求印刷质量和便利性。

通过多轮协商，双方均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安特生和赫勒采纳丁的提议，在欧洲制作印版，在中国印刷文本，维曼因待印专著无几，希望继续在欧洲出版。丁、翁也做出让步，表示中方将尽力满足维曼的需求，前提是瑞方“提供一个详细计划，且该计划的实施不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或无休止的拖延”。<sup>[76]</sup>对此，安特生向中方保证，“一旦我们拿到任何成型的专著，我们将向您提供印刷成本的估价，以及如何在中

<sup>①</sup> 此段内容参考瑞典中国委员会会议记录(1931 年 10 月 1 日和 1932 年 1 月 14 日)以及拉各留斯家族档案(私人档案)，这些材料由扬帆研究员提供。

国和欧洲之间最好地分配印刷的建议。”<sup>[77]</sup>

### 3.3 印刷公司

如果继续在欧洲印刷,印刷公司的选择便成为控制成本的关键。因拉各留斯印刷厂报价过高,丁、翁希望另寻印刷机构。为此,双方就印刷公司的选择,进行多次调研和比价,这一过程在1930年后多部专著印刷商讨中均有体现。

在印刷鲁维《中国鸵鸟化石》一书时,丁文江曾提议在伦敦印刷图版。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调查英国、德国、奥地利、芬兰及瑞典等国印刷成本后,认为伯采尔公司(Börtzell)(即拉各留斯的印刷厂)的报价与霍尔茨豪森(Holzhausen)的报价基本持平,因此向中方建议继续在斯德哥尔摩印刷。<sup>[77]</sup>该提议得到翁文灏的最终同意,由伯采尔公司以2 193.3瑞典克朗的价格承印这本专著。<sup>[75]</sup>在此期间,鲁维曾于1931年3月27日向维曼询问出版进度和其他的出版途径。<sup>[78]</sup>1931年4月1日,维曼回函解释,表示瑞方无权在《中国古生物志》之外的出版物上刊印涉及中国化石研究的专著。<sup>[79]</sup>

此后,丁、翁从赫勒处获悉,马尔默印刷公司(英文:Malmö-firm)的报价比拉各留斯印刷厂更具优势,提醒安特生关注此事。<sup>[80]</sup>安特生随后向翁分析两者的优劣势:拉各留斯印刷厂为老牌印刷机构,印刷质量好,长期信誉佳,且允许赊账,但价格偏高;马尔默和其他外国印刷公司虽能提供优质印刷,但需即时付款,灵活性较低。安特生将中方意见提交至瑞典中国研究委员会讨论,最终决定以帕尔姆格伦的专著图版为样本,在马尔默和拉各留斯两家机构进行平行测试。<sup>[81]</sup>

1932年4月8日,在筹备印刷帕尔姆格伦《半山和马厂随葬陶器》一书前,安特生对比马尔默、总参平印所(Generalstabens Litografiska Anstalt)和格罗曼 & 艾切尔伯格(Grohmann & Eichelberg)等多家印刷机构的印版价格和质量,并将测试结果报告给中方。基于对比结果,安特生建议采用竞价策略,迫使拉各留斯的印刷厂降低报价。<sup>[82]</sup>在地质调查所经费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翁文灏于1932年9月16日正式回复安特生:“同意为地质调查所印制帕姆格伦的专著”,即采纳瑞方的提议,由总参平印所采用胶版印制,费用总计10 405克朗。<sup>[83]</sup>

在筹备印刷英国古生物学家胡步伍(A. Tindell Hopwood, 1897—1969)的《中国象类化石》、史天秀的《中国山东白垩纪下部鲈科之新种属》和师丹斯基的《马及其他有蹄类》3部专著期间,安特生对欧洲印刷报价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与中方商讨出版方案。<sup>[84-87]</sup>

### 3.4 销售方案

1932年9月16日,翁文灏向安特生提出一项新的销售方案,希望通过扩大销售,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一、“尽量限制免费发行”。即将瑞典的“作者赠书”从200册缩减至100册,由此地质调查所可从原有的600册增加到700册;二、“扩大和促进销售”。建议在瑞典或和欧洲主要城市预留印本,协助地质调查所对外销售;三、“加快刊物出版前的准备工作”。包括:(1)建议瑞方完成印刷后,立即将印本

寄到北京，以便中方编印中文摘要；(2)在地质调查所发行两个半月后，瑞方再分发“作者赠书”；(3)在刊物封面底部注明《中国古生物志》的“订购方式”，即销售代理商名单。<sup>[83]</sup>

1934年2月3日，安特生对翁提出的销售方案做出正式回复。关于第一点，安特生建议将瑞典“作者赠书”压缩至50册，其中25册赠给瑞典东方博物馆，另外25册由该馆免费代销。关于第二点，安特生承诺通过他的英文著作《黄土地的儿女》和基根·保罗(Kegan Paul)公司，为《中国古生物志》宣传推广。<sup>[84]</sup>然而，翁因年初遭遇车祸，此时正卧病在床。同年4月19日，丁代翁复函，建议瑞方将非考古类专著印刷总数从800册调整为700册。<sup>[85]</sup>

### 3.5 出版情况

1930年前，由于经费充裕和研究队伍庞大，瑞典出版多册《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且多集中在丙种古脊椎动物系列。随着瑞典出版基金用尽，中瑞双方重新商定出版方案，瑞方专著改由中方提供出版费用。1931年，翁文灏曾建议瑞方自筹出版经费，特别说明该年“除周口店专著有专门印刷基金外，目前在北平尚待出版的专著不少于七册”，中方也同样面临出版资金的困境。<sup>[75]</sup>这反映出地质调查所，或者说中国古生物学界，已经形成自己的人才队伍，并且开始独立开展研究。葛利普曾提到：“化石之研究，最初每托请外国专家。(丁文江)博士亦曾邀请数人来中国任此种工作。此在最初为不得已。今者教育进步，中国青年对于此种研究多有优秀成就，其曾受欧美专门训练之人，已能应付更困难之工作。近年刊行之专集，大多数均出于中国古生物家之手。”<sup>[88]</sup>这也是中瑞合作之初设定的目标之一。1936年末，安特生携带3部拟纳入《中国古生物志》的考古专著来华出版。因全面抗战爆发，安最终无功而返。1939年6月，《中国古生物志》因战争被迫停刊。<sup>①</sup>这也意味着，由安特生主导的中瑞出版合作基本走向终结。

## 4 结 语

在近代中国国势衰微、政局动荡、财政困窘和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下，地质学科虽具“地域性优势”，却受到基础薄弱、人才短缺和资金匮乏等根本性制约，寻求与发达国家合作不失为谋求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其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合作”与“自主”之间的平衡。中瑞科学合作正是双方基于现实需求、权衡利弊后形成的利益整合：中方借助地域性优势，换取瑞方资源解决资金匮乏和人才短缺的初期困境；瑞方则以经济和技术优势，获取中国古生物化石及其优先研究权，以提升瑞典的科学地位。

<sup>①</sup> 据1944年1月4日安特生致翁文灏函中转述，黄汲清曾于1939年6月24日致信安特生，告知《中国古生物志》正式停刊。<sup>[89]</sup>

这种以平等互惠为基石的合作模式,与近代某些借助政治经济及技术优势,以攫取中国文物为目的西方探险队形成鲜明对比。诞生于中瑞合作背景下的《中国古生物志》,也成为中瑞合作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中瑞科学合作初期,双方约定将化石运往瑞典鉴定,并尽可能平分标本,瑞方承担全部费用,成果优先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刊物上。在这一合作框架下,丁文江通过化石共享和印本馈赠让渡部分利益,同时坚守成果“首发权”这一核心科学优先权;安特生则承诺从其在华薪金中捐出约 10 万克朗,用以支持中方出版事业,同时争取赫勒和维曼等瑞典古生物学家的支持,并与拉各留斯共同向瑞典企业家克鲁格筹得 5 万克朗的出版资助。中瑞学者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 1922 年《中国古生物志》的创刊。由于克鲁格基金的条件是出版物必须在瑞典印刷,双方约定瑞典出版基金支持古植物与古脊椎动物系列的出版,北京出版基金则用于考古与无脊椎动物系列。双方的矛盾始于出版基金的枯竭,1927 年瑞典基金用完,中方开始动用北京基金支付瑞方的专著费用,北京基金也随之用尽,加上安特生承诺用于出版的欠薪难以落实,出版经费陷入困境,双方在资金使用上产生分歧。拉各留斯在未了解出版基金的情况下擅自印刷,加重中方财务负担,安特生又因病未能及时回复通信,致使中瑞矛盾逐步升级。最后,丁文江通过瑞典王储解决原则性分歧后,中瑞学者基于尽快出版科学成果的共同目标,在出版细节上相互妥协,形成新的合作出版方案。综观《中国古生物志》的出版历程,经费与沟通上的分歧仅是一段插曲,中瑞学者始终恪守契约精神,坚持互利互信,通过坦诚交流与务实妥协成功化解分歧,使得合作得以延续。

《中国古生物志》体现了中国近代科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双重努力。一方面,丁文江、翁文灏以刊物为枢纽,通过争取国际学者的合作研究,推动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实现本土化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古生物志》超越创刊初衷,成为凝聚地质调查所国际合作成果的平台,如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研究的成果,均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之上。该刊从创办之日便具备国际水准,为中国科学事业铺就一条通往国际的道路。本文虽仅聚焦于以安特生为中心的中瑞科学合作,但《中国古生物志》所承载的国际科学合作史,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致谢** 感谢导师李学通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在本文定稿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扬帆(Jan Romgard)研究员协助校阅瑞典档案、审读全文并补充相关内容,谨致由衷谢意。感谢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Jan Ove R. Ebbestad 研究员,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Vivi Vajda 教授、Ove Johansson 馆员,全国地质图书馆焦奇副研究员为作者查档提供的大力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 参 考 文 献

- [1] 姜玉平. 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期刊及其启迪[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1): 74-79.

- [2]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古生物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3] MATEER N J, LUCAS S G. Swedish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Uppsala*, 1985(11): 1-23.
- [4] 马思中, 陈星灿. 安特生、丁文江与中国史前史的发现[M]. 斯德哥尔摩: 东方博物馆, 2004: 69.
- [5] 陈星灿. 20 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6] ROMGARD J. *Embracing Science: Sino-Swedish Collaborations in the Field Sciences, 1902—1935* [D].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3.
- [7] ROMGARD J, EBBESTAD J O R. *Otto Zdansky: The scientist who discovered Peking Man and explored China's fossil past* [M].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2021.
- [8] 扬·鲁姆嘉德. 从极地到中国: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传[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 [9] 韩琦, 陈蜜. 民国初期的跨国科学竞争——以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缘起为中心[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0, 39(1): 1-20.
- [10] 李学通, 李锐洁. 履约与权变: 安特生、翁文灏在仰韶文化研究中的互动[J]. 考古, 2024(2): 107-120.
- [11] 潘江. 《中国古生物志》与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M]//程裕淇, 陈梦熊. 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6: 39-43.
- [12] 李星学. 前地质调查所古植物学方面的主要成就与贡献[M]//程裕淇, 陈梦熊. 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6: 31-33.
- [13] 孙云铸. 中国研究古生物学之历史[J]. 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 1929, 1(1): 9.
- [14] 师丹斯基. 中国第三纪后期之食肉类动物[J]. 中国古生物志(丙种), 1924, 2(1).
- [15] 师丹斯基. 中国旧新生代哺乳类化石[J]. 中国古生物志(丙种), 1930, 6(2).
- [16]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2 EIA-07. 1932-12-19.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27,0828.
- [17] 丁文江. 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J]. 中央周报, 1935(392—393): 18-26.
- [18] 杨翠华, 访问. 杨明哲, 万丽鹃, 记录. 阮维周先生访问纪录[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第36册.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16.
- [19] ANDERSSON J G. Current Palaeont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22, 46(13): 728-729.
- [20] ANDERSSON J G. The Origin and Aims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J].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29(1): Preface.
- [21] 韩琦. 从矿务顾问、化石采集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C]//法国汉学. 18.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29-52.
- [22] ANDERSSON J G to HALLE T G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0-03-16.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23] TING V K to HALLE T G [R] //T G Halle's Correspondence. 1920-04-17. Stockholm: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24] TING V K to HALLE T G [R] //T G Halle's Correspondence. 1920-10-04. Stockholm: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25] GRABAU A G. Palaeontology in China[J]. *Lingnan Science Journal*, 1929, 682: 679-697.
- [26] ANDERSSON J G to WIMAN C, HALLE T G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0-10-21.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27] ANDERSSON J G to WIMAN C, HALLE T G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1-02-24a. Uppsala: Museum of E-

- volution Archives.
- [28] Palaeontologia Sinica. Descriptions and illustrations of Chinese Organic Remains[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29] WONG W H to LAGRELIUS A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5-02-09. Stockholm: Stockholm City Archives.
- [30] ANDERSSON J G to WIMAN C, HALLE T G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1-02-24b.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31] WIMAN C, HALLE T G to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1-12-20.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32] WONG W H to WIMAN C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30-03-03.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33] 半. 中瑞科学会之梗概[N]. 申报, 1922-07-16(7).
- [34] 陈星灿. 安特生当年发掘的文物是如何运出中国的[N]. 中国文物报. 2007-06-08(7).
- [35] 杨钟健. 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J]. 科学, 1947, 29(2): 355.
- [36] 韩琦. 科学、外交与欧美之旅——丁文江在 1919[N]. 文汇报, 2019-12-27(2).
- [37] 孙承晟. “他乡桃李发新枝”: 葛利普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6, 35(3): 341-357.
- [38] 葛利普. 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J]. 中国古生物志(乙种), 1922, 1(1).
- [39] 傅兰林. 中国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J]. 中国古生物志(甲种), 1922, 1(1).
- [40] 舒罗塞. 蒙古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J]. 中国古生物志(丙种), 1924, 1(1).
- [41] 安特生.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石穴遗址[J]. 中国古生物志(丁种), 1923, 1(1).
- [42] ANDERSSON J G to TING V K,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6-05-03.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354, 0355.
- [43] TING V K to The Crown Prince of Sweden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0-30.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302, 0303, 0304, 0305.
- [44]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T G Halle's Correspondence. 1925-02-09. Stockholm: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45] WONG W H, TING V K to The Swedish Palaeontologia Sinica Publication Committee [R] //The Lagrelius Collection. 1923-03-30. Uppsala: Museum of Evolution Archives.
- [46] 翁文灏. 民国十四年地质调查所办事报告[G]//李学通. 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4.
- [47] 翁文灏. 地质调查所民国十五年办事报告[G]//李学通. 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1.
- [48]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5-11-20.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047, 0048.
- [49] 杨钟健. 杨钟健回忆录[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20. 58-59.
- [50]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7-07-05.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792, 0793, 0794, 0795, 0796, 0797.
- [51]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7-08-12.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11, 0812, 0813, 0814.
- [52]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7-10-03.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09a, 0809b.
- [53]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4—1927 EIA-01. 1927-11-28.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07, 0808.

- [54] WONG W H to LAGERBERG J De [R] //T G Halle's Correspondence. 1930-10-30. Stockholm: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 [55]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8 EIA-02. 1928-05-12.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19, 0620.
- [56]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8 EIA-02. 1928-01-2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25.
- [57]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8 EIA-02. 1928-02-07.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716, 0717.
- [58]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8 EIA-02. 1928-10-2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21.
- [59] LAGRELIUS A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 EIA-05. 1928-11-15.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096.
- [60]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29 EIA-03. 1929-10-09.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47.
- [61]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0-06-25.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130, 0131, 0132a.
- [62] WONG W H to LAGRELIUS A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 EIA-05. 1930-08-08.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097.
- [63]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09-0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12, 0613.
- [64] LAGRELIUS A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0-09.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359.
- [65]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0-11-0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125, 0126.
- [66] ANDERSSON J G to TING V K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1-21a.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05a, 0605b, 0606a, 0606b.
- [67] ANDERSSON J G to TING V K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1-21b.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08a, 0608b, 0609.
- [68]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1-21.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07.
- [69] ANDERSSON J G to TING V K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1-28.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03a, 0603b, 0604a, 0604b.
- [70]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2-09a.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597, 0598.
- [71]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0-12-09b.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120.
- [72] ANDERSSON J G to TING V K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01-16.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101, 0102, 0103, 0104, 0105.
- [73]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02-02.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58, 0259, 0260.
- [74]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R]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

- 03-2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123, 0124.
- [ 75 ]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08-03.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48, 0249.
- [ 76 ]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0 EIA-04. 1930-12-29.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595.
- [ 77 ]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06-25.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46a, 0247.
- [ 78 ] LOWE P R to WIMAN C [ R ] //Sweden: Upsala Universitets, Upsala. 1931-03-27.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rchives, DF/ZOO/230/122/18.
- [ 79 ] WIMAN C to LOWE P R [ R ] //Sweden: Upsala Universitets, Upsala. 1931-04-01.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rchives, DF/ZOO/230/122/18.
- [ 80 ]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08-21.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52.
- [ 81 ]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1—1932 EIA-06. 1931-12-11.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55a, 0255b, 0256.
- [ 82 ]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2 EIA-07. 1932-04-08.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07a, 0807b, 0808.
- [ 83 ]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2 EIA-07. 1932-09-16.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817, 0818, 0819.
- [ 84 ]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4 EIA-10. 1934-02-03.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525a, 0525b, 0526, 0527.
- [ 85 ] TING V K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4 EIA-10. 1934-04-19.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457.
- [ 86 ]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4 EIA-10. 1934-09-28.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533、0534.
- [ 87 ] WONG W H to ANDERSSON J G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5 EIA-12. 1935-07-0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281.
- [ 88 ]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J]. 高振西, 译. 独立评论, 1936(188): 20-23.
- [ 89 ] ANDERSSON J G to WONG W H [ R ] //JOHAN GUNNAR ANDERSSON Correspondence 1939—1950 EIA-19. 1944-01-04. Archive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0691a, 0961b.

## Collaboration Across Borders: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Swedish Scholars in the Found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alaeontologia Sinica*, 1922—1939

LI Ruiji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Palaeontologia Sinica* (*Zhongguo gushengwu zhi* 中国古生物志) established in 1922 by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was among the earliest Chinese scientific journals to gain global recognition. This study utilizes Swedish archives to unveil a little-known history of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ve publishing behind this journa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laeontology, Chinese and Swedish scholars adopted a collaborative model in which the Swedish side provided funding, the specimens were shared equally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s. This collaboration also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publishing funds, the “Beijing Fund” and the “Swedish Fund”, which ultimately facilitated the launch of *Palaeontologia Sinica*. However, when both funds had become depleted, and the publication faced a financial crisis, disagreements over the use of funds aros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se differences were further exacerbated by a series of contingent events, which led to a conflict. Ultimately this conflict was mediated only after Ding Wenjiang (丁文江) appealed directly to the Swedish Crown Prince. Once the fundamental disputes had been resolved, scholars from both countries adhered to the spirit of the contract and mutual trust, making compromises to reduce costs and expedit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Swedish results. They jointly devised a new plan covering funding,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The founding and transnational publication of *Palaeontologia Sinica* not only showcased the foresight and wisdom of Ding Wenjiang, J. G. Andersson and Weng Wenhao (翁文灏) in advancing science but also reflected Chinese scholars’s efforts to safeguard scientific interests and the spirit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trust between Chinese and Swedish scientists.

**Keywords** *Palaeontologia Sinica* (*Zhongguo gushengwu zhi* 中国古生物志); Sino-Swedish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Zhongguo Dizhi Diaochasuo* 中国地质调查所); V. K. Ting (Ding Wenjiang 丁文江); W. H. Wong (Weng Wenhao 翁文灏); J. G. Andersson